
浙江精神与浙江现象的文化动因

何显明 许新荣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勤劳聪明的浙江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披荆斩棘,敢为人先,开拓出了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发展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创造了一系列惊人的奇迹。从 1978 年到 1999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 124 亿元增长到 5350 亿元,年均递增 13.3%,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第 12 位跃升至第 4 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331 元增长到 11993 元,在全国的位次由第 16 位跃升至第 4 位。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全省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1978-1999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04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6 个百分点)增长到 8428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65 元增至 3948 元,位次分别跃居全国 4 位和第 3 位,年均实际增长 7.3%和 8.9%。全省多数地区城乡居民生活已提前基本实现小康,城乡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存款余额、居民消费水平及电话普及率等反映现代人物质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

作为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原先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的省份,浙江在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扶持,除了地处东部沿海以外也没有诸如毗邻港澳台的特殊区位优势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拥有某些特殊的地域文化资源的浙江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精神面貌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裂变,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奋发进取的精神气质即人们通常所称的“浙江精神”,构成了浙江改革与发展强劲的内在动力,并形成了浙江主要靠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改革进程的内生型的发展模式。

—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的社会现代化,都离不开精神动力的支撑。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揭示出,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同这些国家的人们具有的源自新教伦理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民族主义精神和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作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充分激发和调动传统文化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是成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范例。浙江的改革进程同样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正如那些到过浙江,或与浙江人有过较多较深接触的人往往对浙江人某些共同的精神素质,如能吃苦、有头脑、善经营、会做生意、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等等产生强烈印象一样,浙江人在改革开放的传大实践中的确焕发出了一些值得称道的精神素质,如不等不靠,自己救自己,自强不息的自主精神;敢冒风险,敢闯天下的开拓创新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难万险,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拚搏精神;不盲从,不张扬,多做少说,做也不说,以实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以及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善于变通的精神素质等等。这些在普通百姓特别是千千万万个走南闯北的“浙江老板”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可贵的精神气质,赋予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生机盎然的创造性活力。

国民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是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所反复证明了普遍的规律。而个体或民族素质的提高,不是一个单纯的智力和能力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强烈的进取精神、高亢的热情、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同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的价值追求,可以充分调动人的各种潜能,将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使社会发展表现出生机盎然的创造性活力。相反,一个精神萎靡的人,哪怕智力再发达,也将会一事无成;一个精神追求同社会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人,其行为对于社会进步往往只有消极意义可言。“浙江精神”之所以能够为浙江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就在于这一精神深刻地体现了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中人类精神世界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要求。

1、自主精神。社会个体摆脱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观念枷锁,实现“个体自觉”,确立自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是现代化进程在人的观念意识中的深刻反映。马克思就曾把传统社会形态向近代社会形态的演变概括为从“人的依赖关系”

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认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使独立的个体“自由地互相接触”成为现实的可能。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明晰的所有权关系和自由竞争的运作规则必然地要求每个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发展。没有自强自立,自做主宰的自主精神,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市场主体。浙江的改革发展之所以充满活力,就在于计划体制的文化精神遗产的相对稀薄,以及较早的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使浙江人较早地摆脱了“等靠要”心理的束缚,迸发出了强烈的自主意识,从而使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成为现实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使千千万万曾被视为保守、狭隘,最需要教育开导的基层农民,成为走在改革最前列的弄潮儿。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市场主体意识的萌发,有力支撑起了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2、理性精神。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生活全面理性化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常识的普及和科学精神的昌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逐步摆脱迷信、巫术和陈腐的教条本本的束缚,人们开始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的许可,理智地确立自己的行为目标,并通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和谋划达到既定目标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将理想转变为现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过程;一个不断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摆脱蒙昧无知的精神状态的过程。浙江人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尚空谈,注重实干,务求实效的精神特质,就是这种理性精神的生动体现。无论是各地从实际出发探索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在有限的制度空间内寻求体制创新的灵活变通能力,以及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之间在管理模式上的取长补短,都能看出浙江人这种不盲从,不务虚名,不搞花架子,务求实效的行为取向,它同邓小平倡导的“猫论”的精神旨趣是完全一致的。理性化的行为取向使浙江人在改革发展实践中,排除了种种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在客观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实现了手段和效率的最优化,从而大大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3、世俗精神。现代化变迁反映到人的精神层面的一个重要趋向,是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观念日趋世俗化。随着宗教权威的式微,大众参与的日趋广泛,以及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兴盛,社会个体不再向往和臣服于宗教僧侣、“劳心者”建构的某种神圣的价值系统,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追求自己世俗的幸福生活。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以经济利益作为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杠杆也从根本上排斥各种乌托邦冲动和坐而论道的行为取向,以实干和巧干谋取实利,是市场逻辑在个体行为上的必然体现。人们由此而逐步摒弃了空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冲动,不再受制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类的陈腐观念,而是大胆地追求实利,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并由此而形成了由社会大众而不是少数特殊人物主宰、塑造社会生活的局面。浙江的市场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先声夺人,就在于生存的压力,以及商业文化传统的熏陶,使浙江人较早地摒弃了那种耻于言利,羞于经商的陈旧观念,较早地确立起了同市场逻辑相对应的一整套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为浙江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动力。在此期间,浙江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也顺应潮流和民意,逐步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最初以较为宽容和开明的态度默许广大群众为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采取的某些冲破旧体制的举动,到进一步着眼于浙江改革与发展的绩效积极支持和引导群众自发性的改革创新,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浙江的实际创造性结合起来,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了“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以及“不动摇、不攀比、不张扬、不争论、不气馁”的工作思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浙江广大人民群众从脱贫致富,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世俗愿望出发,大胆地从事改革创新实践,创造了相对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

4、开放精神。从封闭走向开放,是现代化变迁过程社会生活结构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国际派,资本无限扩张的动力总是驱使着市场不断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正是在这样一种“扩展秩序”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的精神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和安贫乐道、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惰性心理越来越普遍地遭到人们的唾弃。浙江人富有一种非常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心理素质,那就是敢于和舍得放弃自己原先熟悉的生产方式,大胆地尝试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敢于走出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前赴后继地走出家门,天南海北地闯荡市场。于是,弹棉花的可以一路弹到拉萨,补鞋的足迹可以遍及大江南北,务工经商的更是天涯海角无处不见其身影。“满天飞”已经成为浙江人一种很有特色的生存和发展模式。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素质的基础上,浙江发展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市场大省,“浙江村”、“温州城”遍布全国各地,以致于形成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市场”的可喜局面。

5、创新精神。现代化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变革,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那种静态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如一日的局面,使日新月异的变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使创新能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人的创新能力是综合素质的集中反映,它是科学素质和人文修养的体现,更是人的精神素质、精神面貌的体现。没有不断创新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意向,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等都将无从谈起。浙江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充分激发出了浙江人的创造性活力,使浙江人形成了冲破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努力追求新生活的强烈冲动。相比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浙江人脱贫致富的创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体制外的创新性实践,即在计划体制之外千方百计地寻求工业化、城市化的新途径。从全国第一批发放的个体工商户执照,到第一座农民城,第一批闻名全国的农村专业市场,第一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第一批股份合作制企业及其规范性的行政规章等等,这一系列全国第一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所具有的创新勇气和智慧。

6、人文精神。社会现代化带来的人的精神世界变革的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崛起。随着神权主义和封建愚昧主义的逐渐没落,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确立,人本身至高无上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尊重,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于是,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社会个体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社会个体不是虚幻的偶像或专制政体的手段和工具,人作为目的的价值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尊重和体现。以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为指针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最深刻的人文意义,就在于通过破除僵化、压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重新确立了社会个体相对独立的的目的性价值。人不再仅仅是实现某种空想的社会价值的工具,不再是僵化的思想教条的奴隶,而是具有了自足的价值和意义。社会个体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以及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实施的冲破旧观念、旧体制束缚的创新行为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精神”的焕发过程就是现代人文精神的萌发和张扬的过程。无论是普通群众所现出来的不等等不靠的自主精神,还是各级党委政府顺乎民意,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给予的尊重、保护,都深刻地体现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蕴含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浙江精神”,集中和生动地体现了浙江人民在由传统农业文明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精神世界所发生的深刻裂变。它的孕育生成有着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走向。尽管“浙江精神”所反映出来的浙江人的精神世界的变革依然是初级形态的,但由于这种精神是在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进程中生成的,符合现代化变迁的潮流,因而也就适时地为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建构了不可缺少的社会价值背景,为浙江内生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二

“浙江精神”的孕育生成,无疑与浙江人现实的生存条件与生存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如人多地少,工业化资源的短缺所形成的生存压力与逼仄的生存空间,迫使浙江人不得不以“走出去”、“闯市场”的方式来寻找生存与发展的机遇。浙江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国有经济比重小,国有投资少,迫使浙江人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另辟蹊径,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私经济来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同时,浙江人所接受的计划经济负面的社会文化遗产相对较少,这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摆脱“等靠要”的惰性依赖心理,如此等等。除了这些较为直接的社会因素外,进一步追根溯源,“浙江精神”的孕育,实际上还与浙江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浙江是一个著名的文物之邦。7000年灿烂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为“浙江人精神”的孕育、滋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积淀了深厚的文化精神底蕴。

1、独特的文化环境与鲜明的主体性精神

浙江区域文化精神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靠天不靠地,自作主宰的主体性精神。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摆脱了对外部自然与社会共同体(国家与宗法家族)的依附心理,以及对于正统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盲从心理,形成了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意志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自主精神。面对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浙江人既不消极沉沦,听从命运的摆布,也很少表现北方燕赵之士那种慷慨激昂的刚烈之气,而是“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国语·越语》),充分高扬主体的能动精神,充分发挥自己敏于机变和富有韧性的特长,去克服困难,实现自己既定的最终目标。越王勾践能屈能伸,为雪大耻、图远志,卧薪尝胆,坚韧不拔,直至最终实现复国灭吴的抱负,正是浙江人这样一种智慧而坚韧的品质的生动体现。从理论形态上讲,这种自主

精神在阳明心学那里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由王阳明集其大成的宋明心学,在人们的思想受到经学和理学的严重禁锢的时代,直指人的本心,主张“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将作为外在道德律令的“天理”化作人内心的良知,用“良知”去“知恶知善”,从而极大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因为以“吾心”作为万事万物的“主宰”,个体就从受“天理”宰制的客体转化成为拥有“天理”的自主者。“吾心”由此成为善恶是非的最高标准,成为每个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良知法庭。于是,一切外在权威都因此而丧失了天经地义的神圣性。阳明心学以其鲜明的张扬个体自觉的思想色彩而构成了近世中国启蒙思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晚明以来出现的个性解放思潮,几乎无不滥觞于对王阳明独信自家良知,提倡“狂者胸次”学说的发挥和改造。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学也仍然是接受和阐释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本土思想资源之一。尽管浙江文化的自主精神传统,并不完全等同于近现代意义上个性解放学说,但它们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这就使受到这种文化精神熏陶的浙江人在近现代对于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实践表现了很强的适应性。

从浙江区域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浙江是受中原文化同化较晚的地区之一。此前创造的于越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赋予了浙江区域文化许多不同于中原文化的个性。尽管南宋时期浙江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就长期而言,浙江一直处于全国政治与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浙江人受到的国家机器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控制显得相对薄弱,容易形成富有自主性和个性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自古以来,浙江游离于正统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甚至“异端”思想家代不乏人。东汉的王充“不守章句”,同当时流行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晋的嵇康公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压抑和束缚人性的礼法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宋代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则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明代王阳明提出的“六经皆史”、“良知良能”、“知行合一”等学说,黄宗羲提出的“无君说”,无不是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论;有清一代,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的龚自珍,对专制政治扼杀人才、摧残人性、禁锢智慧的罪恶进行了愤怒的控诉,特立独行的章太炎更是首倡革命的著名精神领袖。直到四五时期,对传统主流文化的阴暗面进行彻底清算的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浙江,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等。当满清王朝为建立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推行残酷的“文字狱”时,浙江是查缴禁书最多,受迫害的文人和思想家最多的省份。这些都说明浙江人的思想观念是比较富于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当代浙江的改革开放实践之所以能打破单纯依靠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进程的被动局面,形成主要由基层群众,由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改革进程的内生型的发展模式,应当说是与浙江人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富有自主意识的精神传统,及其激发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从事创新性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分不开的。

2、发达的商业文化与鲜明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浙江有着悠久和发达的商业文化传统。在先秦时代,越国的范蠡(陶朱公)、计倪就曾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理论。随后的近千年时间,由于远离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当汉末、魏晋南北朝及隋末发生的政治大动乱给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带来严重的浩劫之际,两浙地区却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到唐代,浙江已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两宋以来,浙江更一直是全国手工业、商业和国家财政税收来源的中心。工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市镇的发展。唐代的杭州、明州(宁波)均已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南宋时期,杭州已成为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商业都市,全市人口达到了一百万以上,市民从事的行业达414行之多。明清以来,随着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市镇更是迅速发展起来。据历史资料,明代以后杭州、湖州、温州等均辖有几十个市镇,小者千户,大者万家以上。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商业市镇奢华的生活方式一旦成为浙江文化历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浙江人“舍本逐末”、“趋利好贾”。《宋史·地理志》上的两浙路人“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的记载,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浙江人的生活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特点。工商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文化的发达,大大削弱了儒家正统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对浙江人的实际影响力。

相比于中原文化所具有浓厚的伦理文化的色彩,浙江文化具有突出的经济文化的特征。因而,如果说中原文化的理性更多地体现为实践理性或者说道德理性的话,那么,浙江人的理性则带有鲜明的经济理性的性质。具有这种理性意识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按照“经济人”的行为偏好来进行选择。鄙薄空谈,崇尚实干;轻视说教,追逐实利,注重世俗享受,正是他们基本的行为取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涌现出了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独树一帜,最能代表浙江文化精神传统的

浙东事功学派。严格地讲,讲求事功并非南宋时期以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事功学派独具的精神特色,而是浙江学术思想一以贯之的传统。概括而言,事功精神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的经验主义认识路线。叶适明确提出:“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水心文集》卷二十九)他认为“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又是不可也。”(《水心文集》卷六)《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曾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可见注重实践确是浙江学者相当崇尚的思想性格。

第二,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精神。黄宗羲主张儒者之学当以“经天纬地”、经世致用为务,明确以“适用”、“应务”作为学问之道的价值准则。叶适强调:“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在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水心别集》卷二十九)陈亮对朱熹要求学者“以醇儒自律”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认为人除了要有德(仁义),还要有“才”,有“智勇”,才能建功立业。吕祖谦也提出:“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认为“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不可用,工弗学也。学也无所用,学将何为学耶?”(《遗集》卷二十)这种强烈的事功主义的精神传统,构成了今天浙江人不尚空谈,注重实干,追求实效的精神素质的重要精神源头。

第三,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叶适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说“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因为“即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他反对义利两分,明确主张“以利合义”、“义利并立”。同样,陈亮也提出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就曾明确提出陈亮的永康之学与叶适的永嘉之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垢谈性命者,以为尘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颇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第四,工商皆本的价值观念。基于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浙江的许多学者还对传统的“本末”观念及鄙视商人的价值观念提出了质疑。例如黄宗羲就曾针对“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针锋相对地提出“工商皆本”的新观念。王阳明则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近世观念,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王阳明全书》卷二十五)。

第五,世俗化的行为取向。明清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业市镇的繁荣,浙江文化也出现了一种世俗化的趋向。大批文人书生不再一味在科举考试中寻求出路,转而热衷于通俗文学艺术的创作,以满足市民的文化娱乐需求。李渔、洪升、徐渭等都是其卓越的代表。与这种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相适应,一大批学者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大胆的反叛,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价值观念。例如,黄宗羲就曾提出: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就是人人“各得自私,各得其利”。明代的思想家陈确也公开提出,人的自然欲望是人类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根源,“所欲所聚,推心不穷,生生之机,全恃有此。”人欲是不可遏制的,更不可灭绝,“真无欲者,除是死人!”“存天理”并不以“灭人欲”为前提,相反,“理在欲中”,“人欲正当处即是天理”。陈确还勇敢地为私利、私念辩护,提出:“有私所以为君子。… …彼古之所谓仁圣贤人者,皆从自私之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极者也。”(《陈确集》卷十一)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世俗价值追求的正当性,肯定私利的合理性,这不仅是对正统道德观念的公开否定,而且意味着对合乎商品经济发展和世俗化进程要求的新的价值观念与生存方式的吁求。这无疑是浙江文化走出中世纪的重要思想信号。

上述同正统文化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的种种“异端”思想在浙江大行其道,并构成浙江区域文化传统的重要特色,实际上正是深刻地反映了浙江人在自己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生存性格。可以说,浙江人之所以能够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是与上述这些同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息息相通的,富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世俗主义气息的文化精神传统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

3、开放性的社会环境与富于创新的精神活力

“浙江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勤于探索,富于机变,敢于创新,勇于开拓。创新的活力来自开放的心灵。只有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头脑灵活,不盲从,不迂执,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主体,才能对环境的变迁作出机敏的反应,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才能摆脱各种陈旧观念和僵化体制的束缚,大胆地吸取一切于有利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丰富自己的生活的文化成果;才能以敢冒风险、敢闯天下的勇气和超常规的思路,积极从事创新性的社会实践。应当说,浙江人是比较富于这种精神素质的。从文化历史渊源来讲,浙江人的这种精神气质与以下几个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浙江是个海洋大省,有着相对发达的海洋文化传统。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环境与生产实践,培育出了浙江人心胸开阔,富于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性格。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作为一个沿海省份,浙江早在先秦时代就同朝鲜、日本、印度、大食以及其他沿海省份有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明州、温州都已是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南宋时,杭州、明州是全国四大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对外贸易往来更是盛极一时。元朝统治者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其中浙江就独占其四,足见地位之重要。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不久,温州、杭州也相继辟为通商口岸。悠久而发达的对外贸易经济,以及广泛的跨国文化交流,极大地开阔了浙江人的视野,培育出了浙江人乐于接受新事物,兼收并取,博采众长的开放性的文化心态。

其次,浙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移民社会。西汉末年、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北宋末年因战乱而引发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浙江几乎都是北人南渡的首选之地。北人南渡,给两浙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与文化的融合。据历史资料,在晋末的人口大迁移中,浙江地区的人口增加了近8万户(从西晋太康元年到刘宋大明八年)。在北宋末年的北人南渡期间,浙江人口60年间增加了56万。在杭州等地甚至出现了外来流民远远多于当地土著居民的情形。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经济和文化的的发展。伴随大批北方移民涌入浙江的,是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在两浙地区的广泛传播。从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发展的角度讲,这种由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与碰撞,及其形成的多元价值与文化并存的局面,必然会极大地削弱人们对某一种价值信仰体系的盲从,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大解放,形成宽容的文化心态。在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人们得以见识和学习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果,得以体验和感知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与风土人情,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学习的能力,创新的愿望等等都由此得到了增强。浙江人思想解放,不默守陈规,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应当说与这种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再次,浙江是近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较早和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西学东渐最初是从基督教的传入开始的。长期以来,地处东南沿海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浙江一直是基督教在华的主要传教区域之一。为争取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好感和信任,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大量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这就在客观上使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接触到了全新的西方文化,他们的思想视野由此变得大为开阔。浙江也由此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地区。特别是这一次的西方文化传播,正值浙江这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朝着理性化、世俗化、功利化的方向发展的时期,这对于传播启蒙主义思潮,利用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加快浙江人民走出中世纪的历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浙江许多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学人都是西学的热衷者,这决不是偶然的。如李之藻、杨廷筠对西方科学技术及教育制度的推崇和对西学的译介,黄宗羲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广泛吸收,朱舜水对西学务求实证的科学精神的倡导等等。这些对于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开阔人们的视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这一方面使浙江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摧残,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为浙江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近代工商业的兴起,近代教育的开办,中西人员的往来等等,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近代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接触到了大量同资本主义文明相关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生活方式。浙江由此也成为近现代中国同西方经济文化联系最紧密的地区之一,成为中西文化会通的前沿。这一切对于进一步弘扬和光大浙江人敢于创新、勤于探索、勇于开拓的精神传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浙江的改革开放实践真有什么特殊的资源的话,长期的对外开放和交流,以及由此塑造形成的浙江人开放性的心灵和适应市场竞争的生存性格,应当是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精神,经长期的流变和熏陶,已深深地积淀在浙江人深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之中。即使受到一时的压抑,一旦外部环境提供了相适应的氛围,又会重新苏醒和焕发出来。可以说,在今天浙江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大放异彩的“浙江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浙江独特的区域文化精神传统的当代体现与升华。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中共慈溪市委党校)